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中的日语因素问题

沈 国 威*

一、引言：汉语的近代演化及其研究

语言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而近代以降，汉语的变化却是巨大的。汉语的种种变化可分为本体的变化和社会功能的变化，本体的变化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表达形式、文体（语体）等不同的层面；语言社会功能的变化即语言使用者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人使用语言时的价值取向。近代以后人们对待或使用语言的心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民族国家的成立使自然语言层次上的某一区域的“方言”成为全国通行的“国语”，成为敬仰、爱戴、维护的对象。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超出了笔者的专业范围，在此不作过多涉及。

20世纪初以后的汉语某些变化被特别称之为“欧化语法现象”，这一称呼似有两层含义，一是汉语接受了某些西方语言的特点；二是汉语的变化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西文书籍的翻译等实现的¹⁾。上述看法是否百分之百地正确，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讨论，至少汉语的变化是在与西方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下实现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欧化语法现象”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²⁾。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进入50年代后，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58年）中深化了自己40年代的工作。同期的研究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以及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关于日语借词的一些讨论。但所有这些学术的探索都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了了之。1990年，香港高中教师谢耀基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香港：光明图书公司，1990年）旧事重提，却未能引起预期的反响。本领域的研究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新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如夏晓虹、王风编著

*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关西大学ICIS事业推进担当者

1) 王力说“欧化主要是英化，”又说“谈欧化往往同时谈翻译，有时差不多把二者混为一谈。这也难怪，本来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501页。

2) 来华传教士们更早、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参见沈国威“西洋人记录的世纪之交的新汉语”，《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42辑，2009年4月1日，101~111页。

《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袁进著《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刘进才著《语言运动与现代中国文学》(中华书局, 2007)、徐时仪著《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吴晓峰著《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市川勘·小松岚著《华语百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年)、贺阳著《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8年)等³⁾。新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意味着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开始关注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的近代嬗变。但是就现状而言, 以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为切入点的研究,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出了语言研究者的工作⁴⁾。

现代汉语的形成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的言文一致运动为出发点, 在此之前被称之为“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时间的上限甚至可以追溯到9世纪⁵⁾。迄今为止的汉语研究, 近代的或现代的, 以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素材为对象的研究占主要地位, 着眼于汉语如何由近代向现代转变这一历史过程的问题意识较弱, 这方面的具体研究也较少。20世纪以前的汉语是否处于“超稳定结构”的状态? 近代以后, 汉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 凡此种种的课题都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

二、汉语的演化: 天演抑或进化?

严复在《天演论》中将evolution译为“天演”, 将ethics progress译为“进化”, 用前者指称自然(界)的变化, 用后者指称人类道德的升华。尽管“天演”的立意(即“理据”)极好, 但最终为来自日语的“进化”所取代, 严复所意图的区别也随之消失。需要指出的是: “进化”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术语, “进”与“退”相对, 意味着事物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发展变化并逐渐完善。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机械进化论、文明发展阶段论的进步史观⁶⁾影响波及思想界以及其他人文科学领域, 例如语言的变化也被视作一种进化。在中国, 进入20世纪以后, “进化”成为学者们讨论汉语在世纪之交所表现出的急剧变化和今后发展方向的关键词。学者们毫不怀疑地认为: 语言也和社会一样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 有野蛮、文明之分; 象形文字的汉字与原始初民的结绳记事一样属于“野蛮”, 汉字要想摆脱“野蛮”的境地必然要走拼音化的道路; 同样, 汉语应该由意合向形合发展, 因为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不够科学; 胡适

3) 刁晏斌的《现代汉语史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作为一本讨论现代汉语形成问题的专著, 内容与本文的“欧化语法现象”多有重合。

4) 这一点与五四时期相同, 尽管有吴稚晖、章太炎等关于万国新语的讨论, 文学方面要求改革汉语的呼声似乎更大。

5) 例如王力指出: 从13世纪到19世纪的鸦片战争是汉语的近代(王力《汉语史稿》、1958初版、中华书局1980年版、35页)。吕叔湘则认为9世纪是近代汉语的开端(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所收吕叔湘的序文)。

6) 理雅各在1857年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就已经介绍了“未开、野蛮、半开、文明”的观点, 而“野蛮、半开、文明”的文野三阶段论主要受日本的影响。参见沈国威·内田庆市编著《近代启蒙的足迹》, 大阪: 关西大学出版部, 2002年。

所谓的作文应该“讲文法”就是主张汉语应该向西方语言学习制定一套摸得着看得见的规则⁷⁾。胡适在《国语的进化》中毫不客气地批评孙中山的“言语有变迁而无进化”的观点，说：

试问他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那一种“变迁”为“进化的”，那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

胡适提出了一系列标准来判断语言的进化与否：“表情达意的能力增加吗？记载人类经验更正确明白吗？还可以做教育的利器吗？还可以作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吗？”但是，现在人们开始怀疑这种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袁进说：“我们过去一直有一个误区，我们相信“五四”一代的新文学家所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一大进步。这也意味着我们确信，语言是在不断进化的。我本人过去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其实，这种看法未必正确。根据语言学研究，语言很难说是进化的，语言是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结果很难说是进步还是退步”⁸⁾。袁进的言说反映了学界的反思。

在摒弃语言进化论的同时，我们必须回答：语言为什么要变化以及怎样变化的？事物的变化存在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语言变化的内因被定义为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相信语言变化受某种自然发展规律的支配，这种规律或许和人的生理机制、思维样式有关⁹⁾。但事实上，我们更多的是用这种想象中的“客观规律”来遮掩我们对于众多的客观事实的无知。语言变化的外因就是社会对语言的影响。社会的变动必然引起语言的变动，因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要为社会所用。那么，语言变化的重要推手是内因还是外因？似乎没有人否定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则。例如，王力认为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汉语内部的原因，外部的刺激只不过促进了实现的可能性¹⁰⁾，尽管他没有说这种内部原因是什么。袁进也引用外国学者的言说指出：“语言一旦出现巨大的变化，往往与外部的变动有关。‘如果民族的状况猝然发生某种外部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那只是因为语言恢复了它的自由状态，继续它的合乎规律的进程’”¹¹⁾。

语言要适应表达的内容，即人类知识的日益增长，这是语言之所以变化的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可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语言也随之变化。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即顺应时代的要求。而这一点又是与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接触、交流分不开的。在古代受语言媒质（纸张、印刷术）和人员移动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知识的增长是低速的，语言的变化也是一个不易察觉的极缓慢的过程。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知识的传播提高了速度，语言也加快了

7) 参见胡适《文学改革刍议》、《国语的进化》（《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260—259；505—513页）、《作文不讲文法之害》（《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81—82页）。

8)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60页。

9) 例如经济性原则和区别性原则的动态平衡左右语言变化的观点。

10)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王力文集1》，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435页。

11) 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60页。

变化的步伐。语言变化的契机实际上包含了使用者和语言本身两方面的内容，前者即顺应新时代的价值取向，语言使用者为此不断追求新的词语和表现形式；后者则是为了满足时代的要求，语言不得不进行某种调整、完善。如果说前者只是一种“追赶流行”的话，后者则是本质性的。语言本身具有不断完善自己的机制，借此保证语言社会功能的顺利实现。近代以后东亚诸语言的变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东西、东东的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环境下加速；二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愈来愈多地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语言的接触可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前者指人与人的直接沟通，即战争、边界、移民、贸易等引起的语言现象；直接接触以口头语言为主，是日常用语、物品名称的借用和洋泾浜混合语产生的原因¹²⁾。后者主要是指作为知识载体、媒介的书籍的移动及抽象知识的获取所引起的语言交流，主要通过书面语实现。间接接触促成了抽象词汇的发生和文章体裁的变革。以汉语为例，中国古代，“通语”与“方言”是对汉语不同变体的认知，传夷夏之言的通事舌人是体验直接语言接触的先驱。而两汉以后的佛经翻译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简介中外语言接触。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东来，特别是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以后，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了西来的“外国语”的存在。在与外语的遭遇中，汉语被相对化，同时由于教科书、词典等的编纂，汉语在语词的层次上与外语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译词、新词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增加，表达方式、句型上有了发生了变化。跨语言沟通使人意识到外语的存在，意识到语言之间的差异，有了学习、吸收的可能性。相同的现象在日语、朝鲜语的近代演化中也可以观察到。广泛、深度的互动是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各语言的共同特征。学者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中西语言接触对于汉语变化的促动作用。吕叔湘曾指出：“西洋文明的接触同时直接在我们的语文上发生了影响，最重要的是词汇的改造，新的词语跟着新的物件和新的思想像潮水一样的涌进来；其次是文法方面，也增加了好些新的语句组织的方式”¹³⁾。王力也说“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¹⁴⁾。“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¹⁵⁾。

第二点是人为因素的干扰问题。近代以前人为因素在语言变化中所起的作用较弱，近代以后，随着自然语言与国家相关连，人为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加了。某些语言的变化，如标准音的制定、普通话的推广、汉字的简化、整理字形字种、术语的统一标准化等等都是国家层面制定和实行的“语言政策”的成果¹⁶⁾。保护国语的纯洁性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出现。同时，我们无法忽视社会精英个人的巨大作用。他们将国家、社会落后的原因归结到语言身上，认为汉语是落后的语言，汉字是野蛮的文字，不足以完成新时代所赋予的任务，必须加以改造。如鲁迅说：“中国

12) 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言語接触とビ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東京：白帝社、2009。

13)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初版194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5页。

14) 王力《汉语史稿》、1958初版、中华书局1980年版、516页。

15)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1944年、《王力文集1》、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434页。

16) 但是，人为因素中的政治影响力有被夸大的倾向，例如将采用北方音作为标准音的决定归结为一票之差的投票结果等。

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¹⁷⁾。东亚近代的启蒙家们往往具有极为强烈母语自卑情结，他们热衷于改造甚至废弃母语。

我们是否可以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19世纪以后东亚诸语言发生的变化同社会的嬗变一样可以称之为“近代化”，即语言的近代化？近代化的语言应该有哪些特征？语言要适应人类知识的增长和人员的移动及由此产生的交流。何谓“近代”？作为语词的“近代”是modern的日本译词，其所表达的是一个西方史学的时代划分的概念。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和尺度切分历史的长河，英语的modern、日语的“近现代”、汉语的“近现代”，在内涵上既互相离散又互相重合。但是，如果追根寻源地问什么是“近代”？市民社会、国民国家、产业革命、启蒙主义、进步史观、知识、理性……都应该是我们讨论“近代”的关键词，而“科学”则毫无疑问地会成为近代之所以为近代的金科玉律般的标准。所谓的近代化的语言都有哪些特点，或应该具备哪些特点？笔者赞同胡适上述的四项标准，认为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能产性）；可以用来讲授学习新知识（传播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普及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性（民主的机会均等）。

三、汉语近代演化的内容与实质

回过头去看一百年来汉语发生了哪些变化？而自王力1944年的《中国语法理论》起直到贺阳2008年的新著，学者们一直在试图列出一张现代汉语欧化现象的清单。下表是先行研究中涉及到的“欧化语法现象”。

1. N的V结构（父亲的教训）
2. NV结构（空气污染）
3. PP的V结构（对于电脑的迷恋）
4. 代词的欧化
5. 第三人称代词书面形式的性别（他 vs. 她）
6. 指物第三人称（它）
7. 指物第三人称的复数形式（它们）
8. 指物第三人称作主语
9. 人称代词受定语修饰（聪明的我）
10. 区别词的发展

17) “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276页。胡适在谈到汉语之所以没有文法（学）时也说“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这里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语言优劣观。胡适《国文法的研究法》，519页。

11. 复合量词的产生
12. “一+量词”的用法
13. “之一”用法的发展
14. 复合介词的使用（关于、对于）
15. 在N的V（之）下
16. 介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加
17. 连词的欧化
18. 助词的欧化
19. 被字句的发展
20. 语序的欧化现象
21. 并列连词和选择连词的语序变化
22. 主从复句的语序变化

毫无疑问，这个清单需要继续充实、确定。例如我们可以在语音、词汇、语法形式、语言使用等各方面补充以下的事实¹⁸⁾：

- a. 新词译词的发生、新的造词模式的出现
- b. 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
- c. 词汇的多音节化
- d. 同素近义词群的产生：改、改革、改善、改良、改变、改进
- e. 新词缀、类词缀的出现与频繁使用：性、化、手、品…
- f. 形式动词的使用：开始、进行、结束、加以、给予、施加…
- g. 复合型介词的出现：对于、关于、作为、由于、基于

在确认个别现象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把握汉语的变化，也就是说，上面所罗列的语言现象反映了汉语哪些重要的、本质性的变化？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要求汉语能够表达更多的新概念，并提高描写的精密性。如果说前者是一个词汇层面的问题的话，后者则是一个从词汇到句法结构的复杂问题。从语言形态论的观点看，汉语这样的SVO型语言的修饰成分应该位于被修饰成分的右侧（后部），这样才有利于作出精确描写。但是，汉语的修饰成分却在被修饰成分的左侧（前部），加之近代以前的汉语不具备体词·谓词之间的词性转换手段，谓词无法直

18) 这里暂不讨论“口语文取代文言文、普通话的制定、简体字的推广”等社会语言学层面的变化。另外，汉语的近代化不仅是词汇和表达形式（常常被作为语法层次）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意义，即作为国家、民族、自我三个层面认同的核心装置；语言使用者获得了“国语”这一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以降东亚各语言的变化，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在描述东亚语言的近代演化过程时，语言接触所引起的互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接修饰体词，因此描写的精密性受到严重的限制。消除这些弱点的要求可以说是汉语变化的内因，同外语的接触则是促成汉语“剧变”的外界因素。例如，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指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严复的意思是：英文中的名词可以（使用关系代词的形式）随时（从后面跟进）进行解释，就如同汉语的夹注一样，所以西文的句子动辄数十个词而汉语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句子形式。如果省略这些修饰成分，又怕翻译得不完全。笔者认为以下2项是解决描写精密性问题的主要手段。

1. 获得了体词·谓词之间的词性转换手段（主要通过语词的多音节化、形式动词）
2. 复合型介词的频繁使用。

体谓词转换的实现及复合式介词的使用使汉语的定语修饰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汉语定语修饰成分的复杂化是汉语近代化进程中最具本质的变化，可以说很多重要的变化都是由此引起的。

如果弥补自身的功能不足算是自然规律的话，我们应该更多地发掘这种自然规律究竟是什么。

四、“欧化语法现象”与日语

如上所述，“欧化语法现象”这一称呼有两层含义，一是汉语接受了某些西方语言的特点；二是汉语的变化是西方语言影响的结果，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西文书籍的翻译等实现的。关于第一点，我们必须解明某种现象是从无到有，还是仅仅是被“激活”¹⁹⁾。第二点则是造成影响的具体路径问题。欧化是通过翻译实现的，所谓的“翻译”不言而喻的是西方图书的翻译。因此在谈到“欧化语法现象”时，日语因素并不再考虑之中。这是因为，一，从语言形态论上看，汉语是SVO型语言，而日语则是SOV型，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完全是异质的语言，故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²⁰⁾。二，中国需要吸收的是西方的新知识，而不是日本的知识。例如，王力就曾经说：“日本原有的词我们并不需要借，因为只有新概念才需要新词，而新概念并不是日本原有的词所能表示的”²¹⁾。从汉语接触外语的历史上看，19世纪初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将西方的近代学术体系介绍到中国来，经他们之手的各种语言资料，如译书、辞典、教科书等真实的反映了西方概念词汇化的过程。进入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相继开设了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外语学习机构。至19世纪末，梁启超在谈到中国沿海地区的英语学习时说“西文西语之当习。今之谈洋务者莫不

19) 贺阳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中用统计的方法对某一活跃的语言现象是外来的新现象，还是古已有之但被激活做了细致的考察。

20) 但由于汉语中也存在宾语前置的把字句以及“文选、笔洗”等词语，明治初期访日的中国官僚、文人对宾语前置的语词似未有特殊的反应。惟黄遵宪指出了日语宾语在动词之前的特点。参见沈国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1994年，86~92页（2008年改订新版89~96页）。

21)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528页。

言之矣。虽然有欲学焉，而为通事为买办以谋衣食者；有欲学焉，而通古今中外，穷理极物，强国保教者。受学之始，不可不自审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标名中西学馆、英文书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胜数²²⁾。从中可以了解到英语学习设施的剧增和学习目的的多样化。而日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甲午之后，战争的失败使日语成为外语学习的对象。但与“为通事为买办以谋衣食”的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学习动机不同，学习日语被认为是吸收西方新知识的捷径，加上康有为、张之洞、梁启超等的极力鼓吹，日语易学、易译，甚至可以不译而读的“中日同文”说遂广为流传，一时留学日本、翻译日文书成为风潮。尤其是考虑到以下的事实，所谓的“欧化语法现象”中是否存在大量日语因素也就成了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了。即，

1. 日语图书多为西方书的译本；
2. 截至五四时期为止东文图书翻译的数量远较西文译书的数量要多，许多西方的重要书籍其实，首先是从日语转译的；
3. 报刊等各类媒体中的日语资源（包括资料来源及编纂人员的日语知识）；
4. 对现代汉语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启蒙家、文学家等社会精英层的日本背景；
5. 日语翻译群体的规模和形成时期；

西学自东方来，在这一过程中，汉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语的影响。那么，日语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汉语？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词汇，词汇层面共同点较多，尤其是实词类。明治时期的学术性的文章主要使用所谓的包含了大量汉字词汇的“汉文调”文体，这种表面现象掩盖了翻译上的难点，其结果是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汉语。日语词汇不仅通过大量的日语书的中译本进入汉语，编纂汉外辞典、术语词典所参照的也主要是日本的词典。日语向汉语提供了数千个包括专业术语在内词语，以及一批词缀，帮助汉语固化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即使原来结合松散的字符串成为复合词）。迄今为止，在谈到日语影响时也多以词汇层面的内容为主，即日语借词的问题。但是，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日语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词汇的层面。日语在1890年代不但完成了词汇体系的建构，文章体裁也逐渐摆脱了“汉文”的束缚，译成汉语的日语书更多的是日本人翻译的西方书，在这些书里所谓“洋文脉”，即“欧化语法”比比皆是。鲁迅说“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²³⁾例如“when, as, about…”等英语前置词的翻译和定式化都是日语在先²⁴⁾。即使在词汇层面，影响也不仅仅限于个别的新词、译词的借用，新词缀、区别词、同素近义词群（如改良、改善、改革、改进、改变…）出现，乃至多音节化、形式动词的发生、复合介词的出现与普及等都与日语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日语的现象对汉语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只不过我们还未能对日语在汉语近代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作出具体的评估。

22) 梁启超《中西学门径书七种·幼学通议》(1898)。

23) “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76页。

24) 森冈健二《欧文訓読のP》，东京：明治书院，1999年。

五、新的方法与资料

包括日语在内的外语的影响是汉语近代演化的主要外因，而关于演化的具体内容，王力等前辈学者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贺阳的新贡献在于细致地分析了哪些现象来自于外语的新形式，哪些现象只是被外语“激活”的汉语既有的旧形式。在已消除学术禁区的今天，我们的工作是比较全面地记述“欧化语法现象”，包括全新的形式和被激活的形式。汉语如何从19世纪以前的前近代语言演化成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语言的？在汉语近代化进程中西方语言和日语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了解明上述问题，我们编制了题为“中国語の近代「国語」への進化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欧化文法と日本語の影響を中心に”的研究计划，并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经费上的支持。我们的研究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1. 对《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2008》附录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收录的56000词，从中日同形词的角度就其数量、意义分布等进行调查。对使用频率上位2000词进行词源上的考察，以确定日语影响的有无及大小。
2. 利用《人民日报》语料库对1946~2008年间语料中，“开始、进行、结束、加以、给予、施加”等形式动词、“对于、关于、由于、基于、作为”等复合介词的使用情况作历时性的调查。
3. 利用《六合丛谈》（1857）、《格致汇编》（1880年代）、《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20世纪初）、《译书汇编》（20世纪初）等资料，分别对西方语言翻译和日语翻译的文章进行定语修饰成分的调查。

关于中日同形词的调查除了语词借贷方面的词源研究外，还将对日语影响下的汉语词汇多音节化过程提供基本数据；对形式动词、复合介词的发生、普及情况的调查将促进汉语句子的形式、修辞性、表达性的变化的把握。尤其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外语直译造成的定语修饰功能的变化注意不够，我们的调查将提供新的见解。

我们的工作需要在研究素材和方法上有所开拓。毋庸置疑，在汉语和汉语史的研究上应该以本土文献等为主要素材，但是关系到“近代”时，域外的文字材料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包括，

- a. 西方的：汉外辞典、西人的语言研究著作、术语集、汉语的，或外语的教科书、汉译西书、报刊杂志……
- b. 日本的：唐话资料、明治期的译书、双语辞典、术语集、汉语教科书……
- c. 朝鲜半岛的：汉语教科书……

这些材料还可以按照，独立完成、合作完成、境外完成、境内完成等分类。当前急需进行的是文献的整备和目录类的编制。

域外资料的积极导入意味着一个新方法论的明确提起：从周边看中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等成语、俗语都表达了这种方法论的直感。汉语的近代化转型是一个被外部因素加速化的过程，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常常只从汉语的内部观察这一事实（当然不能排除强烈的政治上的原因）。通过“第三只眼”进行观察应该成为与“近代”相关的所有研究的鲜明特点。域外资料中包含着用不同视角观察到的汉语的各个侧面，例如“量词”的问题等。如何使周边资料成为我们研究的资源？迄今为止的域外资料利用，在系统性和发掘的深度、广度上还有待改进。

从中外互动的角度研究汉语近代化的进程，对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汉语的静态情形以及各种变化，利用中国以外的周边资料如，传教士的资料、日本资料加以探讨，解明所谓的“近代汉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进而考察如何演进为“现代汉语”的。通过这样的研究，现代汉语形成的相关诸因素的影响作用、近代中国的“国语”概念与实质的确立、以及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发展等问题都有望得以阐明。这种互动除了包括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外，还应强烈意识到日语对汉语的影响。笔者认为日本资源无论是对汉语的近代化还是汉语研究的近代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远非“欧化语法现象”所能涵盖的。

几个世纪以来，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20世纪之交，汉语迎来了质变的时期，其后，汉语的演化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历史上、现状上把握、描述汉语变化的过程，分析促进汉语剧变的社会的、跨语言的原因是语言研究者的任务之一。